

侵略者鼻子底下的战斗

——回忆柯灵同志编《万象》

杨幼生

一九四一年九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三个月，在上海众多的杂志中又多了一种综合性趣味性的刊物——《万象》月刊。这是一个典型的商业性质的刊物，封面封底的里页，往往各有八页广告，有时正文中间还插有广告。开本比较别致，二十五开，接近正方形，是后来续出的几种类似的刊物中开风气之先的。发行人平襟亚既做生意，又写文章，和鸳鸯蝴蝶派和小报界关系比较密切。除本名外，又用笔名秋翁，别号襟露阁主。他原在福州路山东路西一条小弄堂里开一开只有一个石库门大小的中央书店，以印售“一折八扣”书为主，兼出一些自编的《上海门径》一类的书。平襟亚在“一折八扣”书上赚了钱，于是动脑筋出《万象》月刊。《万象》月刊最初的编辑陈蝶衣也是鸳蝴派里的人物，为他撰稿的主要是鸳蝴派，如程小青、张恨水、王小逸、范烟桥、周瘦鹃、顾明道等。但同时适当刊登新文艺方面的作品，阿英——魏如晦、赵景深、钱今昔、周贻白、李健吾等都曾有了一些作品在那里发表。这个刊物商业气虽重，但不论编辑和发行人都有爱国之心，不与敌伪在政治上沾一点边。这是柯灵后来同意接编这个刊物的政治基础。而当一九四三年中柯灵同志接编《万象》以后，《万象》才起了根本性的变化，成为革命文艺工作者“在全副武装的日本占领军鼻子底下”（柯灵语）继续展开斗争的一个重要阵地。

我是一九四二年秋进的中央书店，当校对。当时，《万象》编辑只有陈蝶衣一个人。但到四三年约三四月间，陈蝶衣忽然不来了。侧面听说，他和平襟亚闹翻了。大概五月初的一天，编辑部新来了一个人，他就是柯灵同志。从此他是《万象》的主编，我和他的外甥王湛贤成了他的助编，中间一段时间我去浙东，徐开垒同志也来担任过助编。

柯灵同意接编《万象》的唯一条件，是要求平襟亚只负责发行方面的工作，不得干涉编务。这一点平后来是完全做到了的。

柯灵正式具名《万象》编辑，是从四三年七月号，即第三年第一期开始的。但实际上六月号就是他编了。这是“除旧布新”的转折性的一期。

一九四三年上半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已逾一年，日军占领租界也已逾一年，这里的文艺工作者，已经连“孤岛”时期那点有限的“言论自由”也没有了，继续出版的报纸刊物，都得事先送敌伪当局审查，如被认为有所触犯，不是整篇抽出，就是满篇“××”，使读者弄不清作者的本意究竟是什么。这时要写文章，如果不想出卖灵魂，似乎也只能谈谈风月了。

但也正如鲁迅所说：“想从一个题目限制了作家，其实是不能够的。”“同是涉及风月的‘月黑杀人夜，风高放火天’呢，这不明明是一联古诗么？”曾在文坛横刀跃马的革命文艺战士们，这时重新拿起来“鲁迅风”的笔，团结到了《万象》月刊的周围。

柯灵接编《万象》后的第一个引人注目的特色，是每期增加一张“书画插页”。这不是一般的插页，让我们略举一些内容，就可看出编者的深刻匠心。

叶绍钧“二十七年夏”（一九三八年）诗：

来时霜橘拦街贱，	今日榴花满树朱。
汉水蜀山行路远，	江烟峦瘴寄屣孤。
情超哀乐三杯足，	心有阴晴万象殊。
颇愧后方犹拥鼻，	战场血肉已模糊。

（一九四三年七月号）

虽是几年前的旧稿，但叶老当时在“大后方”重庆，诗的内容也谈在重庆。他以“客居”之身，倾吐了对侵略者迫使广大中国人民流离颠沛的罪行的愤恨。“大后方”之爱国诗章，竟在敌人的心脏里给登了出来！再配以另一位在“大后方”的作家辛子恺的画：《惟有君家老松树，春风来似未曾来》。就在沦陷区的读者中引起了一种奇妙的不忘沦丧，切盼胜利的情思。

再看夏丐尊诗：

如幻前尘似水年，	佳期见月卅回园。
悲欢磨得人偕老，	福寿敢求天予全。
故物都随烽火尽，	家山时入梦魂妍。
良霄且忘乱离苦，	珍重亲朋此醪筵。

诗后附白：壬午腊月十六日，为余与老妻结褵四十载纪念，知友伉俪醪肴欢宴寓居，席间雪村唱吟，叠韵再四，和者群起，余亦踵成此章。

（一九四三年九月号）

夏丐翁当时在上海开明书店。人们都知道，开明书店是文学研究会的重要出版阵地。在沦陷时期，他们根本无法开展正常的出版工作，但他们坚持了这块阵地，并把一些留在上海的同人养了起来，使他们免于生活无着。参加夏丐翁“羊毛婚”筵聚的如章锡琛（雪村）、王伯祥、顾均正、周振甫以及没有参加倡和诗的徐调孚等都是当时留沪的开明书店同人。《万象》在同一期专辟了《夏丐翁羊毛婚倡和诗》专栏，不仅以志其盛，也且披露爱国诗人们类似杜甫“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的忧愤之情。杜甫作诗，虽也围居危城，毕竟不是当即发表的，而如今的杜甫们所作的诗，却立即公诸敌人眼皮底下，不能不在读者中进一步燃起救国火焰；而对一切魑魅魍魉，无疑是一枚枚难吐难咽的涩果！

除了书画插页，《万象》还用多种方式沟通沦陷区人民和抗日根据地以及大后方人民的心，例如：《文艺短讯》；四三年十月号“戏剧专号”，大量报道《电影在蜀中》、《京剧在蜀中》、《话剧在蜀中》，还全文刊登了金山、宋之的、于伶、章泯、孙师毅等在重庆《祝洪深五十五诞辰》的三字体诗；四四年一月号，专门辟了一个《竹报平安》，刊登内地作家和表演家的书简，但等到快出版时，有些被禁止，只得临时贴掉，弄得页码不全；还经常登载例如《山城掇拾》、《缙云山游记》、《巴山寄语》（以上均黄裳）等内地通讯。

特别是四三年十二月号，插页里刊出了胡考的书画，同时刊出田苗的《忆丁玲》和丁玲的《幽居小简》。关于胡考的作品，《编辑室》曾这样介绍：

胡考先生战后足迹遍全国，曾在延安鲁迅艺大执教，近闻隐居香港，一说桂林，消息杳然。本期插页所刊的素描一帧，及他手书自填的词，都是从胡先生的友人处辗转征求而来，想为关心胡考先生的读者所欢迎。

其实胡考并不“消息杳然”，那时正在上海，并到《万象》编辑部来过，这些诗文，就是胡考本人拿来的，而写《忆丁玲》的田苗也是胡考。丁玲的《幽居小简》则是她抗战前被捕幽居南京托人带出的短简。为了保障胡考的安全，编辑在这里施展了一个“瞒天过海”的手法。通过这些作品的刊登，沦陷区人民的心和共产党中央所在地就一下子接近了。

和这些通讯报道相对照，《万象》还用游记的形式，报道沦陷各地的惨情。平湖的中山公园，“事变以后，因为无人照管，园中的房屋树林都被斫卖一空，到现在只剩下一大片荒凉的废墟了。”硃石倒“比战前还繁盛”，但“娼妓事业也傍着其他事业一同滋生。”（王小竹、王万育：《沪杭线上》）“金华已传染了日本风吕屋的习气，浴池门口均标榜着欢迎男女贵宾。得风气之先，使沪苏的人，也为之惊叹。”（匡沙：《浙上行》）最叫人凄然而愤然的是读四四年二月号上高岑的苏州通讯《天堂哀歌》。作者以哀婉细腻的笔触，神态毕现地写出处于敌伪统治下的“天堂”苏州一个尚未成年的卖花姑娘，为了换取最低的生活费，竟学会了娼妇卖淫般的媚笑，甚至以“长大了做向导社去”作为自己的“志愿”。这种触目惊心的现实和悲愤的控诉，深深地打动读者的心，在他们的头脑里引出一个特大的问号和惊叹号：摧毁少女的纯洁心灵的罪魁祸首是谁？！

四四年四月号，春游季节，《万象》又搞了一个主要是忆旧性的游记专辑：《白门集》写十年前游南京的情景；《湘中梦痕》回忆战前的长沙；《闽赣边陲线上》则更是等于回忆当年红军的情景了。专辑的总名称叫《履痕处处》。当时人们都知道，日军的铁蹄就是“履”。锋芒所指，只差没有明点罢了。这种处在敌人鼻子底下的爱国胆识，是何等可钦可敬！。

柯灵接编《万象》后的又一个引人注目的特色，是新辟了一栏《万象闲话》。这是用“闲话”的名称，面对敌人的刺刀重开杂文之花，当时也属独一无二的园地。被誉为“匕首”和“投枪”的鲁迅式杂文，在整个“孤岛”时期曾以其短小、及时、犀利的特点，发挥过极重要的战斗作用，在“孤岛”文学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上海全部沦入日军之手以后，杂文一时几乎完全绝迹，而杂文作家也有了一定的分化：个别慷慨激昂过一阵，竟步了周作人的后尘，前后言行，判若两人；但更多的则以长时期的缄默表示自己的气节。《万象》有了“闲话”，杂文重新活跃起来，路子虽更需隐晦曲折，然而仍是一种短兵相接的搏斗：人们无情地撞击灵魂中的弱点。“吃、碰、和三点，几乎道尽了人间的一切。……如果说吃是顺序的爬，碰就该是踏着人家脊梁的跨了。能吃能碰，和的希望就浓起来……需要补充的是：这所谓和，并非就是人生的目的，却只是某一局好戏的段落。”（方城：《马将哲学》）“其实这种拣好吃的吃，好欺的欺，凶过自己的就软如羊，并不只小伙子如此，全车的人恐怕都难免吧！”（霍然：《你们在笑谁》）“如其为螺螄，不如为鱼，鱼虽然不免网罟之灾，然而江湖之大，风波浩荡，足以行吟，比之绿苔丛中的螺螄们的悲剧，毕竟有意思得多。”（阿湛：《螺螄》）然而文章点到具体的人和事，触犯就大了。柳枝的《作文与做人》，就因为具体对照周作人说过“言行相顾”和他的实际行动，就一连吃了十二个“××”，吃得读者和作者都不

知所云。

曾是《新闻报》副刊《茶话》主编的讷厂——严谔声先生，也参加了《万象闲话》的行列，他连续写了八篇《闲话》，依旧保持着语短意长的特色，以一句俗语为一篇，联古讽今，针针见血。其中《闲话之四》，谈“完璧归赵”，“璧虽归于赵，赵终归于秦”，结果正如司马迁所说的：“璧终入秦矣！”不明当时的环境的读者很容易忽略过去，以为也是一篇泛论之作，殊不知其中有很重要的历史背景。

原来这一年八月一日，汪伪傀儡政权秉承主子的旨意，在上海闹了一出“收回租界”的丑剧。自从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租界，原为英、美、法帝国主义半殖民地的“租界”早已烟消云散，成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全殖民地。在这种情况下却来一番“收回租界”，岂非滑天下之大稽？敌伪的阴谋目的是十分明显的：一是转移人们的视线，以示英、美、法是帝国主义者，而日本不是；二是给汪伪政权涂油彩，以示它有“独立自主”权，不是傀儡。

搞闹剧，光那么几个人是要“穿绷”的。于是强令所有报刊，在这一天必须表态庆祝，以显出“万民拥护”的样子。这对一切爱国的编辑和发行人真是一次严峻的考验：不表态在当时是不行的，该怎么表？八月号《万象》上于是出现了这样十分奇特的一篇：《可纪念之一日》。它独立于一切文章以外，单成一页，不具名，也没有头和尾：

民国三十二年八月一日是一个可纪念的日子！

它值得我们深思，感奋！

外人统治了百年的上海租界地，今日终告收回！

我们知道租界是一种特殊的存在，它在中国的版图以内，主权却不属于中国，它是帝国主义在华的殖民地。它几乎成为一切罪恶的渊藪，种种黑暗，罄竹难书！

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中国的土地，主权当然属诸中国，毫无疑义，然因中国历年积弱，卧榻之旁，竟容他人酣睡，这是多少可悲，可痛！今日收回租界，当然值得警惕！庆祝！

独立，自主，领土完整，是中国近年奋斗的目标。可喜此种目标，逐步达到，光明不远，值得吾人奋发，共同努力！卒底于成！

民国三十二年八月一日是一个可纪念的日子！

它值得我们深思，感奋！

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出，这篇出自主编柯灵之手的妙文，把对敌斗争的艺术提到了何等的高度！首先，它出了一个无头榜，谁收回了谁的租界？来无龙，去无脉，汪伪希望吹捧他们和日本主子的“功绩”的希望落空了。接着，它发出了向一切帝国主义收回主权的宣言，严正指出“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和“独立，自主，领土完整”的立场，痛斥“卧榻之旁，竟容他人酣睡”的可耻现象。在遣字用句上，也是十分微妙：“警惕”与“庆祝”齐飞，“深思”共“感奋”并提。敌人想搞假戏，它来一个真做，弄得敌伪如骨鲠喉，吞不下，吐不出！在整个抗战史上和抗战文学史上，应少不了记上这一笔。把讷厂的《闲话之四》与此文对照读，我们更可看出所有爱国文人是如何息息相通的互相配合，向人民揭露敌人的阴谋。（在这出“收回租界”闹剧中，各刊物的政治立场暴露的清清楚楚。如《文友》、《中华日报》、《杂志》甘充侵略者的乏走狗，丑态百出。周瘦鹃编的《紫罗兰》，则民族气节凛然。）

这段期间的另一次考验，是“收回租界”事件前两个月，即《万象》四三年六月号临近出版的时候，汪伪政权秉承主子的旨意，要为日本海军三十八届纪念日大吹大擂地庆祝一番。

日本海军节是五月二十七日，也就是当年日俄战争时打败帝俄的日子。各报从五月二十一日起到三十日止，闹了十天，强令六月一日前后出版的刊物都要载文“同示庆祝”。这次是《万象》发行人平襟亚使了很漂亮的一招：他一方面推说六月号已经装订完毕，文章无法插入，一方面和印刷厂联系好，稍为印了一些活页的表示“庆祝”的东西，夹在市内发行的《万象》里，以应付敌伪的检查；至于外销者，则根本不夹。“疾风知劲草”，于此我们也看到了一个发行人的不甘染于污泥的心。

抗战爆发以前，上海是全国文艺的中心，作家和艺术家，不论左、中、右，革命的，反动的，大部分集中在这里。抗战发生以后，随着国民党军队的后撤，一大批文艺家离开了上海，有的去了延安，有的去了内地，有的去了香港。但还有不少革命的爱国者留在“孤岛”，利用租界的特殊条件，继续宣传反侵略，反投降。太平洋战争发生后，这是上海最黑暗最艰苦的阶段，在敌人通令抗日的文化人都必须前去登记的白色恐怖下，又有一批比较暴露的人离开上海，去了苏北抗日根据地，有的辗转进入内地。但还有一部分继续留在上海：少数软骨头怕了，主动去登了记，“落水”了；但绝大多数爱国进步的文艺家，宁可过着清贫的生活，闭门著译，不沾敌伪一点边；有的共产党员的作家和艺术家，则服从党的安排，继续在这里联系群众，同敌人作各种形式的隐蔽的斗争。这后两种作家纷纷为《万象》撰稿，一则以支持这朵被包围在污泥之中的洁莲，一则继续拿起战斗的笔，利用当时最大限度可能的条件，抒发爱国热忱，激励民族气节。《万象》实际上也成了革命的爱国文艺家们“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堡垒掩体。在《编辑室》的话里我们屡次看到这样一些介绍：某某“虽是生名字，却是读者所熟悉的一位”；某作品“出于一位文艺界所熟知的作家的手笔”。的确，刊于《万象》的作者的名字大多是陌生的，但多数是一些文坛老将。这里有：王统照（鸿蒙）、许广平（浩波）、楼适夷（白季仲）、徐调孚（贾兆明、陈时和）、唐弢（潜羽、晦庵）、列车（说斋、鲍霭如）、师陀（芦焚、康了斋）、李健吾（刘西渭）、傅雷（迅雨）、（林）祝敬、柯灵（朱梵）、黄嘉音（胡悲）、姚克、王元化（非骨）、吴岩（高岑）、范泉……在那样的环境中，阵容依然何等坚强！而这些老作家，以不同的文体，不同的风格，所抒发的种种情愫，处巨岩之下而不馁，更显出曲折多致。

许广平的《记荔枝湾》，借对南国乡土风物的怀念，怅锦绣山河的零落，在平静的记叙中见水下激流的翻滚。

《黄金乡的发见者》、《滑铁卢天下成败之秋》、《玛丽安白的悲歌》等，是楼适夷在上海短暂停留期间专为《万象》翻译的作品，这些作品都根据奥地利著名作家史推芬·支魏格的历史小品集《人生的际遇》中译出，抗战胜利后，统一收集在总名《历史的刹那间》的小册子里。《译者后记》中说：

译述本书的动机，是在敌伪统治下，上海文坛群丑猖獗，进步文艺完全窒息的时期，唯一的冒着残害的危险，艰苦的支持了狂海的独木舟的，是友人柯灵兄所编的一本通俗月刊，我就译了这些东西作为小小的支援。

老作家芦焚，在“孤岛”时期就受到敌人的阴损，迫使他不得不声明：有另外一个“芦焚”在冒充他，从此他将改名师陀，把“芦焚”这个名字让给别的“贤者”。为了支持《万象》，他除拿出长篇小说《荒野》以外，又系统地拿出许多篇短篇。《邮差先生》、《孟安卿的兄弟》……是集中刻划内陆的一个小城市的风物和形形色色的人物，这些短篇，抗战胜利后作

者统一收集在一个总名《果园城记》的集子里。由于多产的作家当时稿如雪片源源而来，有时一期《万象》同时刊出他的短篇一到二篇，于是有的改署“康了斋”，有的仍署名“芦焚”。

另一位支持《万象》最力的老作家是唐弢。抗战以前，他就以具有和鲁迅类似的杂文风格而知名。“孤岛”时期，他的主攻方向仍是杂文，是《边鼓集》和《横眉集》的作者之一。上海沦陷以后，在《万象》里他虽还写过几篇杂文，但总的方针已改为从两方面迂回前进：一是写《书话》，治有关鲁迅和其他老作家的逸文逸事考证；二则动手写起短篇小说来。《海和它的子女们》，震撼斗之愚昧；《稻草上》，抗权势之迫压，粗泼雄浑，犹存杂文余风。前一条路，他后来一直走下去，又成专门一家，抗战胜利后出版《鲁迅全集补遗》和其续编，更以鲁迅研究专家和现代文学史研究专家见闻于世。而后一条路，他似乎没有再走下去，登在《万象》里的这两个短篇，大概将成为他的创作生涯中稀有的别具一格的珍品了。

在开明书店等从事了许多年编辑工作的老资格的徐调孚先生给《万象》提供了许多新文坛珍贵史料。由于他见多识广，鉴赏各种老作家的字迹（《闲话作家书法》、《再话作家书法》），考证老作家的作品发表处所及其它（《新录鬼簿》），其分量的厚重，决非一朝一夕之功。另一篇类似的作品《槎溪说林》，则是列车所写。

类此出自老作家手笔的珠玑是很多的，非这篇文章所能一一申述。

除留在上海的作家外，《万象》还常常刊登来自内地的作家的书简或诗文。和蛰居上海的作家们一般都用化名与敌人演《三岔口》相反，对来自内地的作品，编者一律刊出作者的本名，甚至在《编辑室》里指出这些作者的行踪。施蛰存、端木蕻良、张骏祥（袁俊）、沈从文、俞平伯等，都是这样。这是公开的对侵略者的一种示威，毫不含糊地告诉敌人：我们和抗战根据地和大后方是心息相通的。在那样的形势下，是需要多么大的自我牺牲的勇气和决心！

除大量刊登爱国的革命的作家的作品外，柯灵接编《万象》后，又并不一般拒登鸳蝴派人物的作品。惊涛骇浪，是最能看出一个人的本来面目的。事实上，当时有不少鸳蝴派的作家，坚持不与敌伪合作，表现了大义凛然的爱国气节。《万象》于四四年九月号辟过一个“三十年前上海滩”的特辑，登载了包天笑、范烟桥、郑逸梅、朱凤蔚等多篇忆旧文章，平时也经常刊登郑逸梅的随笔、小品等。体现了爱国文艺工作者破除门阀宗派，一致对外的民族大团结。反过来，有一些和敌伪勾勾搭搭的所谓“作家”，虽标榜的是“新文艺”，《万象》却决不刊登他们的作品。

四三年十月号的“戏剧专号”，反映了柯灵同志文艺活动的另一个侧面。沦陷时期，除文学上有一朵洁莲《万象》外，戏剧界也有好几朵洁莲，其中最大的是两个：一个是共产党地下组织直接领导，许多党员如柯刚、张可、戴耘、钱英郁、冯喆都在里面的“同茂剧社”，当时在金都大戏院（瑞金剧场）演出；一个是黄佐临领导的“苦干剧团”，党员白文也在里面。它们都坚持不演敌伪的戏，在艰难的环境中苦撑，直到抗战胜利。这个“戏剧专号”，就是利用文学阵地，扩大戏剧影响，把两条战线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戏剧专号”的另一特色是又辟了一个“平剧（京剧）与话剧的交流”专辑，周信芳、杨宝森、童芷苓、金素雯、陈鹤峰、林树森等都曾撰文发表意见。这又反映了处于日帝铁蹄下的新剧人员和民族旧剧人员的团结一致和艺术上的互相切磋。

这期间还有一件值得一记的大事。四四年九月号上刊出了郁华的短文《关于出售鲁迅遗书》，宣述了一则鲁迅在北平的遗书将被出售的消息，呼吁制止这一行动。同年十一月号，刊登了唐弢（晦庵）的《帝都十日》，虽是游记，又与此事有关。其中“十月十四日”有如下

记载：

(北平)西三条的住宅，为鲁迅先生生前(一九二三年)所购置，经过一番改造与修葺，于一九二四年五月迁入。我们到了门前，已是黄昏时候，经×先生介绍后，我就把在沪家属和友好的意见，代为传达，朱女士当即同意，卖书之议，已完全打消。一代文豪遗物，仍由其家属共同保管，必可避免散失。

这对挽救鲁迅遗物免遭丧失，实在做了一件大好事。(此事之内情始末，唐弢同志已有《帝都十日》解》，载《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三期)

然而，《万象》决不是只登文艺老战士作品的刊物。《万象》有一批青年作者，今天有的在文艺上有相当造诣，有的成为文艺刊物的骨干。且用今天检验效果的眼光，来看一看当年在这方面的阵容。

黄裳(宛宛)、徐开垒(徐翊，现为《文汇报》副刊《笔会》的编辑负责人)、何为(晓芒，现为福建省文联副主席)、林莽(本名王殊，现为外交战线的重要一员)、阿湛(王湛贤)、徐光粦(晓歌、坦克)，这一批当年就以善写散文见长。黄裳作品的清永，徐翊作品的厚实，何为、晓歌作品的深邃，林莽作品的凝重，阿湛作品的泥土气，各具特色。而晓歌则以坦克的笔名写散文和杂文，以晓歌的笔名重写小说。徐翊偶也写小说。

张爱玲、郑定文、沈寂、石琪，这又是一批新起的小说作家。他们作品的题料和风格，又是迥然各异。张爱玲笔调流畅俏皮，刻画的都是中上层人家的形形色色，虽比较游离于人间的忧愤之外，但也不是毫无酸楚。她的作品最早在周瘦鹃主编的《紫罗兰》(一九四三年五月号)上发表，周瘦鹃又在编者的话里加以推荐，引起了文学界的注意。她投来《心经》和《连环套》，从同年八月号起也陆续刊登在《万象》上。一九四四年五月号《万象》上，还刊出了傅雷(笔名迅雨)的《论张爱玲的小说》，把张爱玲及其作品比作“在一个低气压的时代，水土特别不相宜的地方”，“冷不防”地探出头来的“奇花异卉”。全国解放以后，党是重视她的，一九四九年第一次文代会时，她也作为代表参加了会议。她的家庭原本是华侨，不久她离开了祖国。现在听说她卜居美国，在文学上颇负名望。愿她在增进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上不断作出新贡献。和张爱玲的风格几乎形成强烈的对照，郑定文的笔调浓重朴实，深深扎根在现实生活之中，写的是贫寒的知识分子为中心，广及挣扎在敌伪黑暗统治下的被损害的一群。沈寂、石琪则又以笔调粗犷见长，他们笔下的人物，大都是江湖传奇人物，盗马贼、盗尸人、卖艺的、帮会人物等等。郑定文后来不幸在苏北抗日根据地游泳时去世。沈寂现在是上海电影局文学组的电影剧本创作力量。石琪则听说在天津。

柳枝(陈钦源，现在在《文汇报》编辑《笔会》)是当时撰写杂文和鲁迅著作考证文章的后起力量。他的文笔柔中见刚，颇有其师唐弢之风。

白文(叶炫、李笈，现在南京军区文化部创作室)、叶明(梁灿，现正在导演拍摄根据于伶剧本改编的影片《七月流火》)、李宗善，这又是一批当年主要战斗在话剧阵营里的文艺青年，他们在表演艺术上都已有相当的成就，同时又爱好写作。叶明和李宗善的小说和散文大多取材于舞台生涯，而白文的作品(包括诗)，则较多地带有浪漫主义的色彩。

除此以外，沈毓刚(沈翊鹏，现在上海译文出版社)、徐慧棠(余爱绿、康佛露)是两位最早就在《万象》上翻译科学知识作品的作者。女青年作者施济美，也继续发表小说和散文。

形势发展到一九四四年，曾经骄横一时的法西斯营垒，局面每况愈下，他们自身不可克服的矛盾日益显露。他们加紧了对沦陷区人民的压榨和迫害。物价飞涨，盗贼横行，加上美机的经常前来空袭，上海人民愈益处于水深火热，无以聊生的境地。敌伪对早就恨之入骨的《万象》这块阵地，也逐步下手了。从五月号起，掐断了对它的白报纸配给，企图从根本上予以扼杀。平襟亚想尽办法自行买进一批比草纸略胜一筹的灰报纸，虽然“在外观上几乎使《万象》变了一个面目，许多精心选制的铜图，都成了模糊一片”（七月号《编辑室》），但终于坚持出版下去。同年夏，柯灵第一次被日本宪兵队逮捕，关了七天，由于没有抓到把柄，被放了出来。但平襟亚却害怕了。出到这年十二月号，就不愿再出下去。但有一批文艺青年沈寂等感到这很可惜，于是拿过《万象》的出版登记证又出了一九四五年的六月号（第四年第七期）。这是真正的最后一期，主编仍是柯灵。但等刊物发行的时候，柯灵第二次被日本宪兵队逮捕了。这次他吃了大苦。出来后，他计划去内地，但不久抗战胜利了。

秋案以后的贵福

阿 根

清末女革命家秋瑾在故乡绍兴从事革命活动时，绍兴知府是旗人贵福。此人与秋家曾有通家之好，因而在秋瑾主持的大通学堂（实为秘密的革命机关），成为秋的挡风墙；待到大通被告密，秋案发生，贵福因为事涉自己，迫不及待地杀害秋瑾，以作洗刷，不无灭口之意。那么案后的贵福怎样呢？这是很少有人提到的。

秋瑾的胞弟秋宗章在《关于秋瑾与〈六月霜〉》中对贵福的结局，曾有纪述，说：“贵福自办理大通一案竣事……几令无地自容，竟至不安于位，调任安徽宁国府，皖人又不乐有此贤太守，拒之甚力。贵福进退维谷，不敢履任，坐是终清之世，废弃终身。入民国后，自知不容于清议，改姓名为赵景祺。”先于秋宗章上述所说，南亭亭长（即李伯元）在《南亭四话》的“贵福”条下，已曾纪述贵

福调任一事。因为可同秋宗章的记述相印证，且文字颇生动，录此以飨读者。其云：

贵福既杀秋瑾，意不能自安于越，乃运动当道，移知衢府，衢之人，复电政府严拒之。贵既不获逞，乃亲走京师，求他调。俄得宁国府命下，政府接皖北函电，日以数百计，皆拒贵福者也。贵至是始大失望。贵在京寓护国寺，寺僧某亦皖人，矚贵之亡，为联书其斋扉曰：

贵福竟贵，宁国不宁。

贵福杀秋瑾，自以为得计，用革命者的血以洗刷自己，且可保住乌纱帽，染红头上“红顶子”。然而，事与愿违，反成了过街鼠，连身在空门的寺僧也耻其不为，书联语以咒之。可见贵福之杀秋瑾，是如何为舆论所不容。这，真可以告慰于秋瑾的英灵呢！